

列 寧

政 論 家 札 記



赤
手
抓
龍

PDG

目錄

駁論家札記（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商業之利益，論與孟什維克之關係等等）	一
一 一個例子	一
二 不用比喻	五
三 論捉狐狸；論萊維；論塞拉第	六
簡要註釋	二

政論家札記

(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商業之利益，論與孟什維克之關係等等) 三

一 一個例子

我們想像有一個人，他登一座極高的、峻峭的、還沒有人探險過的山。我們假定，他克服了空前未聞的困難和危險，竟登上比起他以前的人更高更高的地方，可是，他還是沒有達到山頂。現在他已處於這樣的一種情況中，即：照所選擇的方向和道路繼續前進，已經不僅是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是不可能了。他不得不掉轉頭來，向下走，找尋別的道路。這種道路即使是較長一些，可是却有達到山頂的可能。從我們所想像的登山者所在的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到過的高處往下走，也許甚至比上山更要危險，更要困難，因為：比較容易失足，不能那麼方便地看清你要立足的地方，沒有因直接升高，直接走向目的地而產生的那種特別高的情緒等等。必須用繩子捆在身上，耗費許多鐘頭，以便用鶴嘴鋤掘出腳級或可以拴牢繩子的地方，不得不以烏龜那樣的慢步移動，而且是

往後移動，向下，離目的更遠地移動，而仍然不能看見；這樣的極端危險的、痛苦的下山是否將結束，能不能找到一條略可靠的彎路，照這條路走，可以重新更勇敢地、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前進、上升，達到山頂上去。

陷於這種情況裏面的一個人，不管他所達到的地點是空前地高，推測他有瞬間的沮喪，那差不多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能夠聽到下面的一些聲音，聽到那從無危險的遠處用望遠鏡觀看這種極度危險的下山的人們的聲音，也許這種瞬間要更多、更頻繁、更艱難的。這樣的下山甚至不能稱爲（照「路標轉換派分子」(三)的榜樣）「使用制動機的下山」，因爲制動機是以計算精確、業已經過試驗的馬車、預先修好的道路、早已經過考驗的機器爲前提的。可是，現在既沒有馬車，也沒有道路，沒有任何東西，完全沒有事先經過試驗的任何東西！

可是下面來的聲音是幸災樂禍的。有的公開表示幸災樂禍，大聲呼喊，高叫：現在他就要摔下來了，活該，不要發瘋呵！有的努力把他們的幸災樂禍隱藏起來，主要是仿照猶達施卡·郭洛武廖夫^①的樣子來行動；他們仰天長歎，面有憂色。可惜，我們的愛懼畢竟證實了！把我們畢生精力都用於準備攀登這座高山的合理計劃上面的我們，在我

① 係俄國諷刺家薩爾蒂可夫「謝德林的小說：『郭洛武廖夫先生們』」中的人物，是一個陰險的偽善者。

們的計劃沒有告竣以前，難道不能要求延期上山嗎？如果我們這麼熱烈地反對這個狂人現在自己所放棄的那條路（瞧吧，瞧吧，他後退了，他下來了，他爲了準備能夠前進幾尺，費了好幾個鐘頭的工夫！可是，當我們經常反覆要求緩和和精確性時，却用最輕蔑的話咒罵我們！）——如果我們這麼熱烈地責難這個狂人，並警告大家不要模仿和幫助他，那末，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攀登這座高山的偉大計劃之愛護，以便不要損害這個一般說來是偉大的計劃！

幸虧我們所想像的登山者，在我們所舉這個例子的情況下，不能聽到這些攀登思想的「真正朋友」的聲音，否則，他也許就要作嘔了。可是作嘔，據說，不能促使頭腦清醒和脚步穩健，尤其是在極高的地方。

二 不用比喻

例子不是證明。任何比喻都是彎扭的。這是無可爭辯的、人所共知的真理，可是，這却不妨礙回想這種真理，以便更明顯地想像一下一般任何比喻的有效界限。

俄國無產階級，在其革命中曾爬到了極高的高峯，不僅和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比較起來是極高的，而且和一八七一年比較起來也是極高的。必須盡可能更冷靜、更清

楚、更明瞭地對自己回答：我們「已經完成」的是些什麼，沒有完成的是些什麼，那時，頭腦就清醒起來，既不會作嘔，也不會幻想，更不會沮喪了。

我們已經如此「純粹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成就，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奪去的。

我們完成了以革命辦法擺脫最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同樣，這也是一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奪去的成就，這一成就尤其寶貴的是：如果資本主義還保存着的話，那在最近的將來，反動的帝國主義大屠殺仍是不可避免的。而二十世紀的人決不會再那麼容易地滿足於「巴塞爾宣言」了，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叛徒們、英雄們，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就是利用這個宣言來愚弄他們自己和工人的。

我們創造了蘇維埃類型的國家，從而開始了一個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代替資產階級統治時代的無產階級政治統治時代。同樣，這也是不能奪回去的，雖然只有用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實踐經驗，才能「造成」蘇維埃類型的國家。

可是，我們甚至還沒有造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敵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力量還會把這奪回去的。必須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沒有比幻想（和衝昏頭腦）更危險的了（尤其是在極高的地方）。承認這個苦的真理，絲毫沒有什麼「可怕」，即使小小的沮喪，也是絲毫沒有正當理由的，因為我們總是信仰並反覆重

述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初步真理的：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需要有幾個先進國度的工人共同努力。可是，我們暫時仍然只是一國，並且，我們在一個落後的國度裏，在一個比其他各國破壞得更厲害的國度裏，完成了多得不可想像的事情。不僅如此，我們保存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的「軍隊」，我們保存了它的「機動能力」，我們保持了頭腦清醒，使我們能够冷靜地估計必須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在什麼程度內退却（以便作更有力的躍進）；必須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怎樣着手改作那還未完成的事業。應當承認，那些幻想不犯錯誤、不退却、不再重新來作尚未完成的事情和做得不正確的事情而就可以完成這樣全世界歷史的「企業」，如奠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尤其是在一個小農國度內）的共產黨人，是一定要滅亡的。那些既不陷於幻想、也不陷於沮喪、而保持機體的力量和靈活性，以便在處理最困難的任務時一再「從頭開始」的共產黨人，則沒有滅亡過（而且最有可能不會滅亡的）。

我們更不許有微小的沮喪，也沒有陷於這種微小的沮喪的理由，因爲我們雖然處在我們的一切破壞、貧困、落後、飢荒之下，但是在準備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領域以內已經開始前進了，而這時在全世界上與我們並列的一些較先進的、比我們富足千倍的、軍事上強大千倍的各國，則在「它們」的，爲他們所稱頌的、爲他們所熟悉的、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內繼續倒退着。

三 論捉狐狸；論萊維；論塞拉第

據說，最有希望的捉狐狸的方法是：用繩把所探到的狐狸在相當的距離內圍起來，並在離雪不大高的地方插上小紅旗；因害怕顯係人造的「人」的設置物，狐狸只有在這種用小紅旗所築成的「圍牆」開放的時候和地方才會跑出來；而獵人就在那裏等待狐狸。似乎，這種人人都要獵取的野獸，其小心謹慎是一個最好的品質。可是，在這裏，「優點之繼續」却成了缺點。人們捉住狐狸，正是由於狐狸之過度小心。

必須自認我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犯的一個錯誤也是因為過度小心。在這次大會上，我是站在最右的一翼的。我相信，這曾是唯一正確的立場，因為當時一個為數極大的（而且「有威信的」）代表集團，以很多德國、匈牙利及意大利的同志為首，採取了一種過度「左的」和「不正確的左的」立場，他們過多地以加緊揮動小紅旗來代替那對立刻和直接的革命行動不十分有利的局面作冷靜的估計。我由於小心，由於顧到這個無疑地不正確的左的傾向不要對共產國際的全部策略以錯誤的方向，曾經用各種方法替萊維辯護，並表示了這樣的假定，即：萊維失掉了頭腦（我並沒有否認，他失掉了頭腦），也許是因為對於左派錯誤之過於驚慌，並說，常有這種情形，即失掉了頭腦的共產黨

人，以後「又找到了」頭腦。當我——在左派攻擊之下——甚至假定，萊維是個孟什維克時，我也指出，甚至這樣的一種假定也還沒有解決問題。舉例來說，俄國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十五年鬥爭的全部歷史（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證明，正如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的一樣，一般地講，孟什維克是絕對不正確的，事實上，他們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却没有排除另一個事實，即在個別場合，孟什維克有時反對布爾什維克是正確的，例如在一九〇七年抵制斯托雷平杜馬的問題上。

從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去八個月了。顯然，我們那時和「左派」的爭論已經過時了，已經為生活所解決了。現在已經明白，關於萊維的問題，我原來是不對的，因為他已經有效地證明，他陷於孟什維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暫時的，不是因反對「左派」極危險的錯誤中的「過火」，而是長時期的、持久的、由於他的整個天性本身。萊維不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老實地承認有重新申請入黨的必要，如因對左派的若干錯誤不滿而曾經暫時失掉頭腦的人所應做的那樣，反而開始卑鄙地暗害黨，從背後掣肘，就是說，實際上替第二國際和後半國際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效勞了。當然，德國共產黨人在不久以前把那秘密援助萊維幹這種高貴的勾當的幾位先生從自己的黨內開除出去以回答這一點是完全對的。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後，德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的發展證明，左派在這次大會上的錯誤已爲他們所考慮到並在糾正——雖然是漸漸地、緩慢地，但却是不屈不撓地；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在忠誠地執行。把歐洲議會主義的、實際上是改良主義的，只是稍爲塗上了革命色彩的、舊型的黨，革新爲新型的黨，爲真正革命的、真正共產主義的黨——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法國的例子也許把這種困難最清楚地表明出來了。在日常生活中改造黨工作的類型，革新平凡的日常工作，力謀做到使黨成爲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不脫離羣衆，而是與羣衆日益密切地接近，把他們提高到革命的意識和革命的鬥爭上來——這是一件最困難，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歐洲共產黨人不利用歐美很多資本主義國度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初所經歷的革命決鬥特別尖銳化時期之間的（可能是極短促的）時間，來對其黨的全部機構和全部工作進行這種根本的、內部的、深刻的改造，那末，這將是他們方面的最大的罪惡。幸而還沒有引起這種憂慮的理由。那不聲不響的、不明顯的、不大吹大擂的、不迅速的，但却是在歐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產黨、無產階級的真正革命的先鋒隊的工作，已經開始了，並且這種工作正在進行着。

甚至從觀察像捉狐狸這樣平凡的事情所得出的政治教訓，也是不無有用的：一方面，過度的小心引導到錯誤上去；另一方面，不可忘記，如果僅僅以「情緒」或揮動小

紅旗去代替對時局的冷靜估計，那就要犯不可補救的錯誤；在困難雖然很大，但滅亡却決非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之下，是可以滅亡的。

現在，萊維想在資產階級面前——並因此而在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面前，在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面前，特別效勞，他恰恰把盧森堡寫得不正確的那些著作重新出版了。我們可用俄國很好的一首寓言裏面的兩句話來回答這一點：鷹有時飛下來比雞還低，但是，雞却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盧森堡在波蘭獨立的問題上曾經犯過錯誤；她於一九〇三年在對孟什維主義的估計上曾經犯過錯誤；她在資本積累的理論上曾經犯過錯誤；她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和普列漢諾夫、王德威爾得、考茨基等並肩擁護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聯合而曾經犯過錯誤；她在其一九一八年獄中的寫作上曾經犯過錯誤（並且她本人於一九一八年末和一九一九年初出獄後曾糾正了自己錯誤的大部分）。可是，雖然她犯過這些錯誤，但她曾經是隻鷹，而且現在仍然是隻鷹；不僅關於她的紀念對於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將永遠是寶貴的，而且她的傳記和她的全集都將成為教育全世界許多代共產黨人的最有名的教訓（在這點上，德國共產黨人再不能遲延了，他們在其嚴重鬥爭中的空前犧牲，只有部分可以用來原諒他們）。「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一具發臭的屍體了。」——盧森堡以這句名言而將使她的名字留傳在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歷史上。可是，在工人運動的後院，在糞堆中，萊維、謝德曼、考茨基這一類的雞和其

整個同類，自然，對於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錯誤是特別興高采烈的。讓每個人去高興他的吧。

至於說到塞拉第，把他可以比做一個敗壞的雞蛋，它帶着響聲和特別……刺鼻的奇香裂開來了。在「自己的」大會上，提議通過一個準備服從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定的決議，然後把一位老耄拉撒里派到這個大會上來，最後以馬販子的粗暴欺詐工人——這却是一種寶貝。意大利共產主義者正在培養着意大利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黨，他們現在，就可以使工人羣衆看到政治欺詐和孟什維主義的最明顯的榜樣了。這種榜樣的有益的^的反作用，雖然不是一下子，不是沒有好多次重複明顯的教訓而表現出來的，但勢必要表現出來的。不脫離羣衆，對於在普通工人面前實際揭露塞拉第的一切欺詐行爲的艱苦工作不失常耐心；不醉心於作太輕率的與最危險的決定；在塞拉第說「甲」的地方，就說「不是甲」；教育羣衆不屈不撓地朝向革命的世界觀和革命的行動；在實踐上老練地利用法西斯主義的最好的（雖然是代價高昂的）明顯的教訓——這樣，意大利共產主義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萊維和塞拉第並不是因本身有特色而特出，而是因他們都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極左翼的榜樣，是「他們的」陣營、國際資本家陣營反對我們陣營的極左翼的榜樣而特出。「他們的」陣營，他們全體，從貢彼爾斯到塞拉第，對我們的退却，對我們的「下

山」，對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幸災樂禍、狂歡、或貓哭老鼠地假哭。讓他們去幸災樂禍吧。讓他們去排演他們的滑稽劇吧。讓每個人去高興他的吧。可是，我們却不讓自己為幻想所支配，也不讓自己為沮喪所支配。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怕多次地、重複而又重複地努力改正這種錯誤——那時我們就會達到最高峯了。從貢彼爾斯到塞拉第的國際聯合的事業，乃是滅亡的事業。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寫成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八十七號上

據手稿排印

簡要註釋

(一)「政論家札記：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商業之利益，論與孟什維克之關係等等」這篇文章沒有寫完。——正文第一頁

(二)「路標轉換派分子」是反蘇的白衛亡命者陣營中的知識界中所產生的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以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標之轉換」這本論文集而得名。「路標轉換派分子」既確信用外國軍事干涉推翻蘇維埃政權完全無望，於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指望蘇維埃國家內部蛻化。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中，給路標轉換派分子作了如下的評論：「路標轉換派思想乃是日益增長並漸漸與富農和舊式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見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十一頁）——正文第二頁